

青春依旧 逐梦未来

□陈芳烈

今年是人民邮电出版社建社70周年。在这70年里，我有61年与它同行，曾见证了它的艰辛创业、浴火重生以及今日的辉煌。人邮社的70年，是一个出版企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的70年；是几代邮电出版人前仆后继，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至毕生精力，创造一个个奇迹的70年；是不断创新、青春焕发的70年。

70年前，来自全国各地电信业界的一批年轻才俊汇聚京城，筚路蓝缕，艰辛创业。他们从只有30来人的编译室起步，开始了创建新中国邮电出版业的艰难跋涉。从倾全员之力编纂《俄华大辞典》和编译几本外文书，到出版以国内作者为主力的原创著作；坚持“立足邮电、服务大众”的宗旨，不断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和大中专教材；奋力抢占业余无线电技术普及的制高点，出版了“大众无线电丛书”“无线电爱好者读本”“业余无线电丛书”等惠及几代青少年的科普读物；创办了《通信技术》《无线电》《电信科学》《集邮》等全国知名的期刊品牌……

70年邮电出版业所取得的巨大成绩，我真想不出如何用简短的语言对它作概括的描述。记得在建社40周年时，我曾以“日出一书”为它感到自豪，而今它却创下了年出书近万种的骄人业绩；当年，它曾立足邮电，把出书范围延伸到了电子、计算机、教材等相关领域，而今它则以服务全社会作为宗旨，把出书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了摄影、运动休闲、经济管理、社科人文等各个领域，还以出版《米老鼠》杂志为契机，涉足少儿出版，终成儿童出版之重镇。历年来，人民邮电出版社获得的各种奖项不计其数，并创造了年销售码洋达到近30亿元的巨大成绩……所有这些，都标志着它的综合实力不仅稳居行业前列，还呈现历久不衰、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。

70年的邮电出版业是几代邮电出版人不忘初心、艰苦努力所结出的硕果，也验证了几代人抓根本、讲诚信、聚人才、重质量的敬业精神和始终如一的职业操守。70年的接力，70年的坚守，进一步夯实了邮电出版大厦的基础。

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，邮电院校陆续向邮电出版社输送人才。1962年我有幸被选中，由此便开始了长达36年的编辑生涯，从青丝直到白发。我为能投身于这一科学文化传播事业，用自己的笔讴歌我国电信事业的蓬勃发展而感到自豪。

而今，当我走进邮电出版大厦，与全体员工共襄建社70周年盛典时，感到格外兴奋和亲切。在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谈笑风生地从我身边走过时，我真想甩掉手中的拐杖，融入他们的队伍，与他们一起续写邮电出版这一青春的事业。

我由衷地祝福我的母校继续踔厉奋发、笃行不怠，以创新逐梦未来，再创辉煌！（作者系人民邮电出版社原总编辑）

清凉一夏是读书

□黄少明

古人云：“夏读书，日正长，打开书，喜洋洋。田野勤耕桑麻秀，灯下苦读声琅琅。荷花池畔风光好，芭蕉树下气候凉……”盛夏之时，披一袭绿意，翠竹倦斜倚，清荷慵娉婷，心安如瓷，清凉如玉，正是读书好时节！

读书一年四季都可读，但在阳光热辣的夏日读书，别有一番意趣，如同一场心灵的旅行，让人在文字的森林中寻找清凉，感受不一样的世界。

夏日手持一本书，犹如把握一片绿荫。书页的影子在脸上跳动，就像树叶在风中摇曳，带来一丝清凉。在这样的时光里，我喜欢读一些古诗词，读陆游的“溪涨清风吹面，月落繁星满天”，读苏轼的“雨昏石砚寒云色，风动牙签乱叶声”，沉浸于古诗词的朗朗上口，书中之境如在眼前，快乐的文字，给心灵带来一份宁静，瑰丽的语言驱散生活的疲惫与烦闷，我在这些文字里学会翩翩起舞，学会堆叠每一个盛夏的符号。

静谧的黄昏，晚风习习，一杯清茶，捧起一本书，扑面而来的淡淡墨香，在优雅的字里行间流连。这个时候，我喜欢读一些散文佳作，看树影婆娑，听蝉鸣悠悠，闻荷塘花香，感受那份雅致与闲情。读到妙处，炎热仿佛也躲起来了，内心铺满了一地清凉。

当然我也明白，阅读并不只是为了清凉。它还是一种探索，一种理解，一种体验。在炎炎夏日，读一本好书，让思绪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拓展，仿如在酷暑中独自寻找一片绿洲，沉浸书中之境，避开外界喧嚣，真正地回归自我，修身、增智、怡情，让我们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。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内心的清凉，感受到阅读的乐趣，那份来自内心的满足和清爽，定会驱散炎炎夏日的酷暑。

有时，我也会坐下来写作。屏蔽外界的喧嚣，心灵开始雀跃起来。我击打键盘，为安静的文字配上抒情乐，为窗外的星空增添更多诗意。梦是属于这个夏夜的，因为读书，这个梦也会做得清凉。

穿越硝烟的笔迹

——父亲李庄的朝鲜战地篇章与家国情怀(下)

□李东东



1979年和1984年，李庄率人民日报代表团两次访问朝鲜，重返三十年前战地采访故地。图为1984年访朝时，李庄（左四）等同志受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接见。

而对自己的战地经历，父亲曾谦虚地说：“与战士们相比，我们这些战地记者受的那点苦实在算不上什么。”父亲的战地通讯和日记中记述志愿军战士的艰苦卓绝和流血牺牲，比比皆是；他晚年的多处回忆中，也记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艰辛和惊险：7月22日，我们正在“三八线”南不远的田间公路疾驶，离汉城只有几十公里处，突然遭到八架美国海军飞机攻击。两辆轿车、两辆吉普，袒露在一条毫无遮掩的狭窄田间公路上，两边稻田一望无际，禾苗长势甚旺。听到飞机俯冲的啸声，几个人从车里扑出，滚到稻田里，几枚小炸弹随之在附近爆炸。一架敌机不知是由于机械故障，还是驾驶员操纵失误，竟撞毁公路右侧一排电杆，栽在我们右前方两三百米的稻田里，起火焚毁。……经此惊险，取得经验，到汉城以后，主人把我们乘坐的轿车都换成小吉普，风挡全都放倒，遇空袭跳车方便多了。

我从父亲的文章中不仅看到了许多无畏的情节，还深深感受到他的无私与敬业。《难得清醒》第42章中这样写道——……马尼安在汉城待了两天，即经平壤、北京回国。他在平壤见了金日成，写了访问记。我和魏于顿对此事毫无所知。魏听说马独自访金大发脾气，说是资产阶级作风，对两个兄弟党记者玩这种手法很不光彩，等等。我一笑置之，没有参与关于此事的议论。因为我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，在战地。

一般来说，新闻记者如有采访政要特别是国家级主要领导人的机会，都会十分珍视、绝不放过，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概不能外——因为这是出稿子、出大稿子、出独家大稿子的绝佳机遇。可是父亲李庄当年却很淡定，不论内心深处还是行为实践，始终如一：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，在战地。这使得他这个在当时的朝鲜就已大名鼎鼎的中国战地记者，直到时隔三十多年后的1984年访问朝鲜时，才见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。

通才与捷才，倚马可待的新闻功力。新闻记者，就其职业而言，是以新闻采访写作作为天职。每一位记者都渴望能在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中，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精品，更多传之久远的力作，并将其作为毕生追求。而要写出精品力作，除了必须具备政治敏锐和新闻敏感，看来还得有一身倚马可待、及至“单兵作战”的真本领、硬功夫。

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陆超祺同志在怀念李庄的文章中，这样描述他们在朝鲜并肩进行战地报道的感受——

跟李庄在战地当记者，可以得到全面的锻炼。不怕苦不怕死，冒着美军的飞机大炮，深入战壕采访，是一种锻炼；还有一种锻炼，是在战火中写稿，出手快。那时从前线到国内没有固定的邮路，没有民用电话，记者的稿子全靠临时回后方的汽车带到丹东（当时叫安东）投邮。李庄有这样的本事：白天和干部战士打牌聊天——一种采访方式，听说晚上或次日有人回后方，马上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写稿，赶在回国汽车开动之前交稿。这是真正的“倚马可待”的硬功夫。1951年二三月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《在汉城》《皇家重坦克雷的覆灭》等通讯，都是用半个白天或一个晚上赶写出的。李庄没有做过国际问题的专职记者或编辑，也没有专门研究过什么国际问题，但1954年中苏美英法政府首脑在日内瓦开会，讨论朝鲜和支问题，报社指派李庄为首席记者，就是因为他有“倚马可待”的硬功夫。

父亲在《复仇的火焰从心里烧起》一文中这样回忆他的一次采访报道：《复仇的火焰》是我第三次去朝鲜战场时，在安东（即今之丹东）伤兵医院里写的一篇通讯。两小时采访，三小时写稿，说文不加点，确是一气呵成。事后看，再有一两小时，稍加涂饰，改得精致一些就好了，当时原不必那样火急火燎。……采写快，处理也快。范长江同志接到此稿，看看有些意思，立即放下他事，亲自编辑、定稿，第二天《人民日报》一版见报。

用。当然，像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，题材重大，角度新颖，当时言人所不敢言，提供了许多新信息，可以称得上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。朱启平的《落日》，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，有感情，有联想，给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，也称得上传世之作。

记者在采访中注意积累材料，最后成为作家的也不乏人。“管一天”，真正抓住、写出人们当时关心的事件，点出暗示它的意义与前途，对读者有所帮助、启发，也可以算得上上乘之作。新闻记者不必妄自菲薄。

可以看到，父亲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魏巍的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重大成就和影响；另一方面在谈及自己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的阙失和教训、兼及新闻工作中个人想到的一些问题时，又特别说明他毫无否定当时新闻报道巨大成绩之意：“那成百成千篇反映中朝人民军队英雄业绩和精神风貌的新闻作品，激励、教育几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当代人，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纪录。它的作用，其他式样的文字并不能代替。”

是的，在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，我国许多新闻工作者奔赴朝鲜战场，屡历艰险，采写发表了众多新闻作品，一些部队记者为中朝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1952年6月，著名作家丁玲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朝鲜通讯报告选》所作序言中，激情澎湃地写道：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报刊杂志发表了上千篇文章，歌颂了我们的英雄人物。这些文章向全国、全世界，作了最忠实的报道。我们从这些诗篇中，看见了我们最关心的人们是如何地生活着，战斗着。我们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，而流泪，而奋起。这些诗因为它们的内容符合了现实，符合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而被传诵着。这些诗人的名字即刻也被人民所熟悉了。刘白羽、魏巍、李庄……都是读者们所羡慕的人们。他们也在朝鲜，他们也穿着志愿军的军装，冒着炮火的危险，成天与英雄们在一起，他们是最懂得英雄的。他们鼓舞英雄们：‘同志们！前进吧。祖国的人民全望着你们哪！’他们又拿英雄们的事迹来教育我们：‘看！多么可爱的人啊！我们能够不努力学习，不努力学习来报答他们吗？’这些作家、诗人，用最大的热情来做这些工作，写了这样多的文章，不只是教育了人民，而且在这文学创作的领域上开辟了道路，放射着光芒。我们能不感谢他们吗？”

父亲从年轻时起，高大沉稳，不苟言笑，勤于学习，笔力雄健，大约从太行或从华北根据地时，就算著名记者了。我那一辈子谨言慎行的老妈妈，发表于2013年的《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》一文中，也写到了青年时期李庄的捷才：就在我和李庄通信前不久，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创刊了。李庄是参加创刊的成员之一，他写了文章《为七百万人民请命》发表在创刊号上，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。当时，人民日报如果有稿子要送邓小平审阅，编辑部总是派李庄去，因为他手快，能很快又准确地领会刘、邓首长的修改意图并能迅速组织语言。邓小平同志很喜欢他，每次去，都给他一包“大前门”香烟。李庄得到邓政委给的香烟，都高兴地拿回来和烟友一块儿享受。

新闻与文学，殊途同归的使命担当。当年，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都是各部队的精锐，定期轮换，以便都能看到见识美国军队，体会出国作战的艰苦。各个领域的人，首先是新闻记者，也包括作家、艺术家、戏剧工作者，都有计划地赶往朝鲜，进行报道和创作，生产了大批反映、记录、歌颂抗美援朝的作品。这里我想谈的感受是，从父亲的实践和体会中，我们看到的还是新闻工作和文化工作既有共同的使命担当，又有不同的工作规律。

为此，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以千百计，影响最大的当属作家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这是一篇报告文学，篇幅不长，《人民日报》一版登载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，一时洛阳纸贵。在朝鲜，我和魏巍同时在38军采访，明显看出记者、作家工作方式不同。两人同时访问，工作都很紧张，记录、提问、思考……我是记者，“现贩现卖”，随时注意怎样把稿件传回北京。战地通讯万分困难，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，山后回谈不上商业性邮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安东，再从安东寄往北京。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，下午到附近山坡上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。当时还没有圆珠笔，都用钢笔写作。天寒笔冻，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，随即呵写，进度很慢，心急如焚。写完回来已是黄昏，常常自嘲这些作品可算得“文不加点”。……作家工作方式不同。我看到魏巍也作记录，有时静坐沉思，大概是在酝酿、揣摩，但未见他动笔。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在若干时间以后发表，可见提炼、概括、精雕细刻，水平甚高之外，又下了极大功夫。

我认为记者、作家任务不同，当然也难截然分开。记者多数写“管一天”的东西，只要真正能管一天，就起了应有的作用。当然，像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，题材重大，角度新颖，当时言人所不敢言，提供了许多新信息，可以称得上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。朱启平的《落日》，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，有感情，有联想，给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，也称得上传世之作。

记者在采访中注意积累材料，最后成为作家的也不乏人。“管一天”，真正抓住、写出人们当时关心的事件，点出暗示它的意义与前途，对读者有所帮助、启发，也可以算得上上乘之作。新闻记者不必妄自菲薄。

可以看到，父亲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魏巍的报告文学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的重大成就和影响；另一方面在谈及自己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的阙失和教训、兼及新闻工作中个人想到的一些问题时，又特别说明他毫无否定当时新闻报道巨大成绩之意：“那成百成千篇反映中朝人民军队英雄业绩和精神风貌的新闻作品，激励、教育几亿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当代人，也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纪录。它的作用，其他式样的文字并不能代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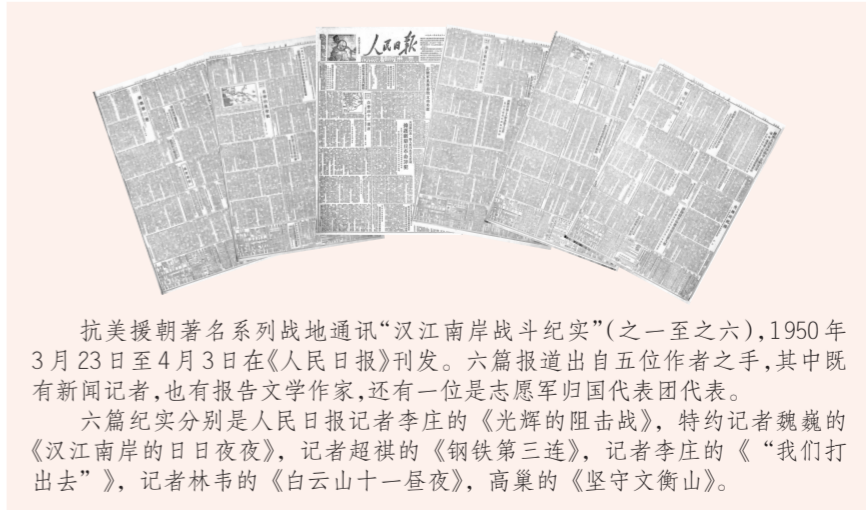
是的，在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中，我国许多新闻工作者奔赴朝鲜战场，屡历艰险，采写发表了众多新闻作品，一些部队记者为中朝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1952年6月，著名作家丁玲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朝鲜通讯报告选》所作序言中，激情澎湃地写道：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报刊杂志发表了上千篇文章，歌颂了我们的英雄人物。这些文章向全国、全世界，作了最忠实的报道。我们从这些诗篇中，看见了我们最关心的人们是如何地生活着，战斗着。我们为他们的行动所感动，而流泪，而奋起。这些诗因为它们的内容符合了现实，符合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而被传诵着。这些诗人的名字即刻也被人民所熟悉了。刘白羽、魏巍、李庄……都是读者们所羡慕的人们。他们也在朝鲜，他们也穿着志愿军的军装，冒着炮火的危险，成天与英雄们在一起，他们是最懂得英雄的。他们鼓舞英雄们：‘同志们！前进吧。祖国的人民全望着你们哪！’他们又拿英雄们的事迹来教育我们：‘看！多么可爱的人啊！我们能够不努力学习，不努力学习来报答他们吗？’这些作家、诗人，用最大的热情来做这些工作，写了这样多的文章，不只是教育了人民，而且在这文学创作的领域上开辟了道路，放射着光芒。我们能不感谢他们吗？”

父亲从年轻时起，高大沉稳，不苟言笑，勤于学习，笔力雄健，大约从太行或从华北根据地时，就算著名记者了。我那一辈子谨言慎行的老妈妈，发表于2013年的《相逢相知在太行山上》一文中，也写到了青年时期李庄的捷才：就在我和李庄通信前不久，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创刊了。李庄是参加创刊的成员之一，他写了文章《为七百万人民请命》发表在创刊号上，邓小平看了非常高兴。当时，人民日报如果有稿子要送邓小平审阅，编辑部总是派李庄去，因为他手快，能很快又准确地领会刘、邓首长的修改意图并能迅速组织语言。邓小平同志很喜欢他，每次去，都给他一包“大前门”香烟。李庄得到邓政委给的香烟，都高兴地拿回来和烟友一块儿享受。

新闻与文学，殊途同归的使命担当。当年，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的都是各部队的精锐，定期轮换，以便都能看到见识美国军队，体会出国作战的艰苦。各个领域的人，首先是新闻记者，也包括作家、艺术家、戏剧工作者，都有计划地赶往朝鲜，进行报道和创作，生产了大批反映、记录、歌颂抗美援朝的作品。这里我想谈的感受是，从父亲的实践和体会中，我们看到的还是新闻工作和文化工作既有共同的使命担当，又有不同的工作规律。

为此，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：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作品以千百计，影响最大的当属作家魏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这是一篇报告文学，篇幅不长，《人民日报》一版登载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，一时洛阳纸贵。在朝鲜，我和魏巍同时在38军采访，明显看出记者、作家工作方式不同。两人同时访问，工作都很紧张，记录、提问、思考……我是记者，“现贩现卖”，随时注意怎样把稿件传回北京。战地通讯万分困难，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，山后回谈不上商业性邮电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的我国边境城市安东，再从安东寄往北京。一般是中午听说有人回国办事，下午到附近山坡上一岩凹隐蔽处赶写通讯。当时还没有圆珠笔，都用钢笔写作。天寒笔冻，只能用口中热气化冰，随即呵写，进度很慢，心急如焚。写完回来已是黄昏，常常自嘲这些作品可算得“文不加点”。……作家工作方式不同。我看到魏巍也作记录，有时静坐沉思，大概是在酝酿、揣摩，但未见他动笔。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在若干时间以后发表，可见提炼、概括、精雕细刻，水平甚高之外，又下了极大功夫。

我认为记者、作家任务不同，当然也难截然分开。记者多数写“管一天”的东西，只要真正能管一天，就起了应有的作用。当然，像范长江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，题材重大，角度新颖，当时言人所不敢言，提供了许多新信息，可以称得上新闻记者的传世之作。朱启平的《落日》，记述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，有感情，有联想，给人以爱国主义的思想营养，也称得上传世之作。



抗美援朝著名系列战地通讯《汉江南岸战斗纪实》（之一至之六），1950年3月23日至4月3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发。六篇报道出自五位作者之手，其中既有新闻记者，也有报告文学作家，还有一位是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代表。六篇纪实分别是人民日报记者李庄的《光辉的阻击战》，特约记者魏巍的《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》，记者超祺的《钢铁三连》，记者李庄的《“我们打出去”》，记者林韦的《白云山十一昼夜》，高巢的《坚守文衡山》。